

短篇小说集



# 云雀

韦 翰



贵州人民出版社

中

B23

短篇小说集

云雀

韦翰

云 雀

韦 轼

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

(贵阳市延安中路 5 号)

贵州新华印刷厂印刷 贵州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5印张 135千字 插页 2

1983年1月第1版 1983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 —— 4,200

书号10115·457 定价0.50元

## 目 录

特别处方	(1)
云雀	(20)
年关雪	(40)
过时的风景 (三篇)	(57)
青青河边草	(71)
伙伴	(83)
落花时节	(122)
不解之缘	(137)
在岔道上	(154)
遭遇	(169)
火苗	(194)
后记	(204)

## 特 别 处 方

春末夏初的一个早晨，阳光比平常更早地照射进门诊部的楼房，电铃长响的时候，我已在诊室里就坐了。值班护士在外面喊号，一会儿，镶着乳色玻璃的白漆门轻轻启开了，一位身材苗条的妇女，象被一阵风吹送着似的走进来，悄悄坐在桌旁的凳子上。今天气温陡升，这位妇女却内着黑毛衣，外罩式样很老的蓝呢短大衣，头上包块旧白纱巾。当她把纱巾取下，在手里揉来揉去的当儿，我见她皮肤虽然较黑，却遮掩不住病态的苍白，清瘦的脸庞上，鼻子略显弯曲，缺少色泽的嘴唇也大了一些，但那一双有点呆滞的黑得深沉的大眼，却把整个面容调整得比较和谐了。奇怪的是这双眼睛好象躲避着什么，老是朝斜角看，使她脖子上的胸锁乳突肌特别突出。乍一看，难以判断她的年龄，大约总在三十至四十之间吧。女人总爱打量女人，虽然是医生，我也未能免俗。

“哪里不好？”我开始照例的询问。

“经常失眠、头昏，半夜浑身燥热，睡着了就做恶梦……”她迟疑一下，脸上泛起些微红晕，“例假也不太正常……”

“什么时候开始的？”

“咳，两年多了。”

据她说，她找过西医也找过中医，作了不少检查，服了不少药物，结果均告无效，近来病情恶性发展，能入睡的时间越来越少。她是听了熟人的推荐，专程前来找我就医的。

她从衣兜里摸出一迭病历、化验单之类递给我，我接过翻了翻，检查、化验的结果大同小异，诊断却比较混乱，甚至互相矛盾，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没什么严重或疑难病症。我戴上听诊器，让她躺在检查台上，仔细作了检查。结果，只发现心脏的跳动有点不大规则，但也没有达到异常的程度。为慎重起见，我给她开了三大常规化验，以及心电图、脑电图、X光照片的会诊单，另开了些镇静药物，并且以纯粹的女性方式，安慰了她一番。她噙着眼泪听完我的话，最后站起身来，轻轻说了声“谢谢大夫”，又象风吹送着她似的，轻飘飘地走出了诊室。她相当衰弱，这是毫无疑问的。

几天之后，轮到我值急诊夜班，临近深夜，所有危重病人都处理过了，我从抽屉里拿出正在写的一篇论文稿，全神贯注地推敲起来。突然，有人在门上轻轻叩了两下，那声音怯生生的，好象怕被室内的人听到。无论是急诊病人，还是值班护士，都不会这样敲门的。所以，我没有理会。稍顷，门上又轻轻响了两下，仍是那畏缩的劲儿。我有点不耐烦了，把稿子扔进抽屉，大喊一声：“进来！”

没有任何反响，死一样的静寂。我生气地走过去，“哗”的一下把门拉开了。啊，原来是她，那个女人！她的装束变了，一件洗得发白的灰上衣，黑布裤的膝部有两块补丁，一手拿着卷成一团的工作服，一手拿着化验单之类的东西。她显然被我开门的动作吓住了，向后退了两步。

“大……大夫，真……真对不起，我……又来麻烦你……”她的声音直哆嗦。

她的不敢仰视的神态，充满歉疚的语调，使我不由得顿起怜悯之心，忙让她进来，请她坐下。

“才下班吗？”

“不，天黑就下班的，打听到大夫你值班，我一下班就来了。看见你忙，我没有进来……大夫，我已经检查过了。”说着递过一叠检查单来。

这么说，她竟等了几个小时。这种对医生的信赖，使我大为感动，忙接过各种单子，仔细看起来。检查结果都是正常的。“怎么样，服了那些药，睡眠好一些吗？”我问她。

“好象好一些。不过，我还是怀疑，我总是害了什么大病了。”她忽然声音颤抖起来，“大夫，我求求你，再给我治一治……我工作忙呀，又有一个生病的母亲，一个还在上小学的孩子……”

我轻轻抚摸着她的肩膀安慰她说：“不要紧，没什么大病。不过，你需要加强锻炼身体，心思要放宽，精神因素是很重要的。你不会有什不愉快的事吧？”

她猛地抬起头来，那双黑黑的呆滞的眼睛，充满痛苦和绝望，不由使我吓了一跳。她呻唤道：“大夫，我就是心思宽不了呵！”

“为什么？能不能给我说说看？来，喝一点水。”

她沉默了，低下头，也不喝水，把裹成一团的工作服不停地揉着，搓着，象要把心里的犹豫、怯懦都揉掉、搓掉。终于，她抬起头来了，眼里闪烁着晶莹的泪光。

“大夫，我对你说过了，你会不会把我赶出去？看到好多

事情现在又翻了过来，我真悔，真痛苦呵！……”

这倒奇了，经过两年多来的拨乱反正，被林彪、“四人帮”颠倒了的是非正在颠倒过来，整个国家原来被搅的象个狂人那样，慢慢恢复了清醒的神志，谁不为此感到幸运和欢欣，怎么会给人带来悔恨和痛苦呢？我起身把门上的插销插上，用一张报纸遮住强烈的灯光，然后亲切地对她说：“看您想到哪里去了，医生怎么会赶病人呢？你说吧。”

她长长地叹息一声，眼睛呆呆地斜视着，沉默了一阵，终于，开始讲述起来：

“大夫，您已经知道，我叫吴翠云，现在是饭店的服务员，从前，我是机械厂的车工。我妈妈很不幸，她是个穷人家的姑娘，被一个国民党军官看上了，强迫讨她做小，生下我才两岁，我们就被抛弃了。好在没有多久就解放，她在国营的豆腐店里找到了工作，把我抚养长大。我在技工学校毕了业，就进了这个厂。在厂里，我同我爱人认识了，他是个技术员，我们结了婚，还有一个男孩，可是……可是我们……我们分开了……”

“他抛弃了你吗？”

“不，是我抛弃了他！”吴翠云把头埋得更低了。

我纳闷地问：“他很坏，是吗？”

“不，他是好人，我越来越觉得他好，坏的是我，是我呀！”吴翠云抽泣起来了。

我惊讶了。象这样痛切地责备自己的人，我还很少见到。我感到，这里面有着什么不寻常的缘由，也许就是所谓的难言之隐吧。要真如此，我该不该听下去呢？

但是，吴翠云却突然兴奋起来了，也不等我问，就滔滔

不绝地接着讲起来：

“大夫，我们的结合是很偶然的。他父亲是在南洋开橡胶厂的华侨资本家，母亲死得早，丢下他姐姐和他。后母对他们不好，他姐姐又是个进步学生，引起了警察的注意，就带着他逃回新中国。他姐姐在中央戏剧学院毕了业，分到我们省的一个剧团当导演，还入了党。他从小就爱摆弄机器，在省里的工学院毕业后，分到我们厂。他是技术员，厂里上上下下都说他肯钻研，有学问，象我这样的普通女工，同他结合本来是不大可能的。

“说来你恐怕不信，我年轻的时候爱唱歌，爱跳舞。他虽然是个出名的书呆子，手风琴却拉得不错。在厂工会组织的联欢活动中，为了排练一个独唱节目，我们认识了。我当时天真得很，被赞扬和爱慕弄得眼花缭乱，昏头昏脑的，对这位给我伴奏的戴着近视眼镜的技术员，开头并没有引起注意。慢慢的，我奇怪了，为什么除了给我伴奏，他平常老是离我远远的？有时候，简直是故意避开我。大夫，我当时是个淘气的女娃儿，借故到他们的办公室去了好几回，还专门找他问长问短，弄得他的脸红齐耳根。我只觉得这样很好玩，一点也没有想到会引起什么后果。谁料到，从此以后，无论在下班的路上，在电影院里，在大街上，在公园里，我常常感到有一双热情的眼睛在盯着我，我注意寻找的时候，忽然又消失了。我不笨，我知道这是谁。

“我们厂工会有个宣传干事，所有的文艺晚会都是他组织的。他三十左右，高高的个子，眉眼也还过得去，就是脸上有一些小疙瘩不雅观。他出身好，是个党员。这个人也在追我。他很会讨人欢心，逢年过节，水果、糕点直往我家里

送，见了我妈妈就伯母长伯母短的，嘴巴甜得很，知道我喜欢看电影看戏，就不断给我送票。也不晓得怎么搞的，我不讨厌这个人，但就是喜欢不起来。他肯定在我妈妈身上下了很多工夫，有一天她对我说：‘云呀，听说有个哪样技术员看上你了，我们穷家小户的，攀上这种高枝桠肯定受气。听说他还有海外关系，公安局都挂了号的，我们这种人家缠上他这种人家，还想过清静日子呀！我看工会这个人合适，人好，出身好，又是党员……’我听了气也不是，笑也不是，连连反问她是哪个技术员看上了我，怎么看上的，有什么证据？把妈妈问得绿眉绿眼的，连工会那个人的事也不敢提了。我过后一打听，好多人都说，有海外关系的公安局真可能挂了号哩。从此，我也就不敢再去惹那个技术员了。

“夏天，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。按照安全操作规程，车工是不能留长辫子的。当时很时兴梳辫子，有的姑娘梳的辫子打齐腰。我的头发又黑又光，舍不得剪掉，也梳了两根辫子，上班盘在头上，用蓝帽子箍得紧紧的。班长是个老好人，见没有出事，就睁只眼闭只眼了。一天下午，天气闷热得很，我车一个新工件，有点紧张，汗水直冒，不晓得什么时候把帽子朝后掀了掀，辫子就慢慢滑脱出来了。刚巧，我发现切屑有点异常，忙俯着身子去看，一根辫子直向刀架拂过去。我大叫一声，魂都差点吓掉了。说怪也真怪，就在这紧急关头，车床上的卡盘竟然慢慢停住了。好多人都朝我跑来。我抬头一看，那个我不敢招惹的技术员，正站在墙边，一只手还扶着总电闸拉下的闸刀……

“车间的同志们都批评我，技术员更是脸青面黑的训我，把我都训哭了。我想，你又不是班长，又不是车间主

任，你凶哪样？为了清理车床，继续车完那个工件，下班后我回家给妈妈打了招呼，又赶回厂里。谁知，车间里电灯明亮，技术员正在我的车床边忙着哩。我发了一阵呆，泪水把眼睛都糊住了。他也发现了我，脸一下红齐耳朵根，口里也不晓得喃喃些什么，倒象做错了事的是他，不是我。突然，我觉得，我很喜欢这个很凶的男人，他比那个工会干部多着一点叫人依恋、叫人愿意亲近的东西。从此以后，什么不能攀的高枝桠，什么海外关系，我全都丢到东洋大海里去了！

.....

“大夫，什么叫做幸福？我现在才明白，幸福多半都不是当时能够觉察的，当时多半平常得很。他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，他的设计常常受到称赞，他的合理化建议常常得到采纳。但是，他一点也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，天晓得他是怎么学会拉手风琴的。我的埋怨，我的唠叨，反而使我们很快结婚了。他姐姐从省城赶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给我们的礼物是一个嵌着他们的父母结婚照相的金鸡心，这是他妈妈临死前留给他们的纪念品。还带来他父亲的一封信，信里说他们的后母已死，叫他们姐弟赶快回去，准备继承遗产。姐姐问他怎样打算，他笑了笑，把信交给了我，对他姐姐说：‘这要问她啦，我现在不仅属于我们的国家，还属于她了呀！’是的，他干的事是属于国家的，他这个人真真是属于我的。他对我说过：‘翠云，有了你，我生活就觉得充实，觉得富足，什么都可以代替，只有你是不能代替的！’这是实话，因为，对于我，他也是不能代替的呀！.....”

吴翠云两颊泛起红晕，觉察得太迟的幸福感使她吃吃地笑起来，现出没有完全消退的酒窝，还有两排雪白整齐的

牙齿。无可怀疑，她原来的确是娇美的。

她自己的笑声使她大吃一惊，抬起头来张皇四顾，随即凄声叫道：“天呵，我在说些什么？我是在哪里？……”

病弱的体质使她经不起这样的兴奋，她身子一歪，晕过去了。

经过抢救，吴翠云很快就苏醒了。我强留她在急诊观察室住了一夜，可是，黎明时已不见她的踪影。此后她鸿飞冥冥，再也没有来找过我，而我的脑子里却时常闪现出她的身影。我暗自奇怪，这个女人有什么东西牵引着我呢？是她那充满哀怨的大眼和卑屈凄楚的语调，还是她那低头侧视的神态和揉来搓去的双手？她自称是个坏女人，究竟是怎么回事？她的病现在好些没有？……也许是对我没有讲完的故事的好奇心和医生的责任感驱使着我，有一天，我终于抽空到她工作的饭店去找她。

饭店的营业已近尾声，我在洗涤碗筷的蒸气弥漫的小房间里找到了她。她正伛偻着腰，在急促地、专注地洗着、搓着，碗盘杯碟发出清脆的撞击声。她看到了我，先是感到吃惊，等我说明来意，她显得惶惑而又感动。

“大夫，你……你真是太好了！……”她喃喃地说着，泪水涌上了她的眼眶。

高原山区的夏季，气候变幻莫测，当吴翠云收拾餐厅的时候，天空划过蓝色的闪电，而且淅淅沥沥地打起雨点来。吴翠云生怕我走了，安慰我说：

“大夫，不要紧的，等会还有个值班的人来，我送你回家。咳，我是个倒霉的人，沾上我就要碰上倒霉的事！”

“你胡扯哪样，这有什么倒霉不倒霉的，回不去，我就陪你一夜。”

一切收拾停当，店里只剩下我和吴翠云二人，非常清静。吴翠云给我倒一杯热茶，我们正要坐下来谈话，突然大门“咚咚”地捶响起来，几下就捶开了，接着进来一位身躯高大的男子，三十多岁，雨衣内露出蓝色的工作服，腋下夹一把塑料伞。他打量我一下，露出笑容，有点憨憨地说：“大夫，你在这里！”我已习惯同记忆不起的人招呼，也就含笑点头，以为他也是来值班的哩，但马上就发觉错了，他转身埋怨吴翠云说：“这么晚还不回家，老人都急死了！”

“我值夜班哩。”吴翠云好象对这人使了个眼色。

“为啥又值夜班？不是前天……”

“你不要管那样多嘛！”吴翠云赶快打断他的话，显然，为了留住我，她耍了点小小的狡猾，“你把伞留下吧，回去麻烦给我妈妈讲一声。”

那男子顺从地把伞放在桌上，象要说什么又忍住了，向我点点头，转身在餐厅外消失了。

我心里涌起了疑云：“他是？……”

“一个好心的邻居，钢铁厂的工人。”吴翠云没有发窘，神色很坦然。不过，这个男子的出现，好象又勾起了她的满怀愁绪。她长叹一声说：“咳，大夫，我没有接近过犯人，不知道他们在认罪以后，是不是觉得不配得到同情，不配得到关心？是不是对自己的过错象对长在身上的脓疮那样，揭露出来会感到害羞？”

我隐隐感到她在指着什么，含糊地答道：“谁知道呢？有的大概是这样，有的就不是，也许……”

“不，会是这样的！因为我自己给自己判了罪的犯人呀！”吴翠云的语气沉痛而坚决，同那夜的情况迥异。“大夫，我没有姐姐，可是你真象我的姐姐呵！对你，我还怕什么羞呢？”，

“我真愿过去的一切是一场噩梦，可惜又不是。大夫，那时候好象是发生了强级地震，房子、人、整个世界都在颠簸，我的家几下就颠翻了。那个工会的干部给我妈妈说过的话，大半都应验了，而且还要惨得多。先是我大姑在省里遭了殃，说她是特务，海外的照片，同海外朋友的通信，连她坚持独身不结婚都成了罪证，因为据说特务都是不结婚的。我爱人本来还不会马上被揪出来，他不是领导干部，不是工程师，在厂里也不逗人恨，可是，省里的造反派来外调他姐姐的问题，他给顶了回去，还向那些人吐口水，这就惹出了大麻烦了。他是个倔得要命的人，开会批判他，他同批判的人辩论，贴大字报轰他，他也贴大字报回击。加在他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，什么‘黑线红人’、‘走资派升官图上的工程师’，什么‘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’、‘里通外国的分子’。越压他越硬，每次回家来头都是昂得高高的。我急得差点跪下来，劝他不要硬顶，他反而笑起来说：‘翠云，你还是红旗下长大的哩，连共产党的规矩都没有学懂！’一天晚上，他惊惶惶跑回家来，要我找出那个金鸡心和他爸爸的那封来信，关在屋里收拾好一会，就把一个装得胀鼓鼓的手提皮包交给我，对我说省里正在追她姐姐交出这两件东西，厂里也有人检举这两件东西放在家里，不晓得要搞什么鬼，现在连同他的文稿、笔记一交起给我，求我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放着。这个要强的人第一次流了泪，对我说：‘看来我是在

劫难逃了，要是我死了，你就留下来交给孩子做个纪念，千万不要交出去呀，交出去要害人的。我已经看透了，这些人是现代的野人，有理智的疯子，共产党是不会让他们长久的！

“不会长久的吗？我当时觉得简直长得没有边哟！我爱人关进牛棚去了。我们的家也被抄了，当然，那个皮包我藏了起来。那是些什么样的日子呀！我好象一下比人矮了半截，走在路上，背后有人指指戳戳的，偶尔还会听到：‘看这个特嫌分子的臭老婆！’可怕的还是揭发我爱人的那些大字报、传单、批判会，把他和他姐姐在国外和国内的一些事说得一是一，二是二，又有鼻子，又有眼睛。要说是瞎编的，党能够准许这样大张旗鼓的瞎编吗？这些事我原来没有听他说过，也没有向谁打听过，我只觉得我喜欢他，他喜欢我，这就够了，看来这实在不够呵！我妈妈早退休了，身体很不好，她哭着说：‘云呀，我们两娘母的命都不好，我过去落了个反革命家属的臭名声，想不到你又落了个特嫌分子老婆的臭名声，这是命呵！’

“大夫，谁知道认命也完不了呀。那个工会干部又对我们关心起来了。我们结婚的时候，他不仅送了礼，还跑前跑后的帮忙，甚至还为我们争房子，热心得很。后来他也挨了批，因为检讨得好，进了政工组。我爱人关起来以后，他就悄悄来我家安慰我，说不要紧，他在造反派面前还说得上话，不久就会放人。隔些天又跑来说，他已经向造反派头头为我爱人说了许多好话，等着好消息就是了。我们觉得这个人真好，一点不记旧仇，也就什么话都对他讲。一天晚上，他一来就愁眉苦脸，唉声叹气的，说我爱人的问题越查越

大，本人态度又不好，造反派恼火得很，查起家属来了，我们处境很危险。当时，街道上也传出了要揪我妈妈的风声，听他这一说，我吓坏了，忙求他想法子。他说，办法倒有一个，就是揭发我爱人。我摇着头，还没有说出‘不’字，他又抢着说，他知道我不忍心，但是不揭发我爱人也是有问题，揭发也是有问题，这对我爱人关系不大，对我们关系就太大了，只要造反派抬一抬脚，我们还想活吗？

“大夫，当时听了他的话，我只有一个念头，不管怎么样，就是要我死，也不能连累我有病的妈妈，所以就可怜巴巴的问他怎么揭发法？这个人反而笑了，说我笨，可以揭发的多得很，比如我爱人平时说过的话呀，隐藏的东西呀……。我一听吓得跳起来，说家都被抄过了，还有啥隐藏的东西呢？这个人又笑了，说我简直还把他当外人，譬如金鸡心和那封海外来信就没有交出来。我把头摇得象拨郎鼓。这个人生气了，说这是亲自听我说过的，现在又来否认，辜负了他的好心。说着拔脚就要走。唉，当时要是我多长几岁，多一个心眼就好了呀！我也记不起是不是对他说过，见他要走，我爱人的嘱咐，我所有的戒备全都崩溃了，一把将他拉住，问他，一个金鸡心、一封信有什么问题呢？他说屁问题也没有，不过说明你们的态度就是了。

“就这样，我爱人交给我的手提皮包落到了造反派的手里。要是我晓得后来发生的事，我宁可交出我的命，宁可我妈妈受连累，也不会交出那个皮包。造反派高兴极了，大会小会表扬我阶级斗争、路线斗争和继续革命的觉悟高，把皮包里的东西摆在厂里展览，又送到省里大姑所在的单位去展览，说我爱人的父亲不仅是个大资本家，还是个大特务，

保留他的金鸡心说明贼心不死；说那封要他姐弟回去继承遗产的信，就是要他们回去接受特务任务；说我爱人的文稿、笔记都是盗窃的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情报。最难堪的是，他们要我同我爱人展开面对面的斗争，发言稿是那个工会干部代我写的。我就象上法场那样，被人挟着走进会场，上了讲台，我那个可怜的人就站在台下。我已经几个月没有见他的面了，他头发乱蓬蓬的，衣服很脏，只有脖子还是那样挺得直直的。见他这样子，我的心都碎了。这就是我曾经决心要跟他过一辈子的人，我孩子的爸爸，可是这算是什么样的会见哟！他象个犯人那样，孤零零的站在台下。我呢，站在他的上面，傻头傻脑的，要来仇恨他，要来揭发他。突然间，我想逃，逃出这个会使人发疯的地方。但，实际上，我大概一动也没有动。主持会的人宣布我发言了，声音象炸雷那样，震得我浑身打颤。就在这时候，我爱人一下掉过头来，那一双眼睛火辣辣的，象利剑一样，透过眼镜片，直穿进了我的心。我昏昏糊糊的，也不晓得念了些什么，一会只觉得天旋地转，一头栽倒在台子上……”

吴翠云说到这里，象猛地被什么东西噎住了，满脸紫胀，沁出一层密密的汗珠，胸脯剧烈地起伏着，那双下意识地揉着的手发出清脆的关节响声。半晌，她老长老长地透了一口气，两颗亮晶晶的泪珠顺着腮边滚落下来。

“大夫，这以后我就象死过一回的人了，恍恍惚惚的。那个工会干部劝我离婚，同特嫌分子彻底划清界限，我很快就同意了。我当时想，一切不幸既然都是从我选错了的这个人引起的，那就赶快结束吧。而且，一想起我爱人那双充满仇恨的眼睛，我就害怕。就在收到离婚判决的那一天晚上，